

教学的真谛

张宪光

老师是以
陪伴青春为业
的人，是青春
的一种旁证。

一位二十七八年前的学生发来微信，说看了《老师·好》，热泪盈眶；还说，我看了也会一直流泪的，因为我是一个感性的人，看了这个片子对自己的工作就更有成就感了。

我对此有些将信将疑，因为我很清楚那种电影会拍成什么样，怎样来制造泪点和笑点，况且也不会轻易流泪了。一天夜深的时候，我独自待在办公室，看了这个电影，却还是不知不觉流下泪来。我自己清楚，这泪主要不是流给这部槽点很多的电影，而是流给那些已经逝去的日子，那漫长的学习与教书生涯里的往事。

二十一岁那年，我从初中母校开始了教学生活，当时我的很多老师都还在那里任教，比如我很喜欢教地理的裴老师、美丽的数学张老师、音乐孙老师等人，对我都很好。

学校位于104国道边上，进门便是一条铺满河沙的路，是由老师和学生们一起修筑的，两旁种满了冬青。路的南边是饭菜做得十分难吃的伙房，门前栽着一排高高的白杨，北面是操场，操场的中间是一个土堆，当地称之为堆堆。后来的考古发掘表明，那个土堆是西晋永康九年的古墓，留存有多块画像石。通常人们都认为靠近古墓不吉利，所以到上面去玩的人很少。操场向东，则是两排长长的教室，教室的前面还有一座假山。

学校当时刚刚投入使用，里外一新。学校的图书室没什么好书，我记得只是从里面借过井上靖的《孔子传》等少数几本书。读书的风气也不盛，能够考上师范或者其他中专，已经是等于有了铁饭碗，此外每年也会有七八个学生考进县一中。在那所学校最辉煌的事，便是有一年举行知识竞赛，我带着初三的几个学生去参加，初赛和决赛都得了全市第一名；当时的决赛是电视上的那种现场抢答，孩子们的表现真是棒极了。

也许是比较顺从和学业还行的缘故吧，我的学生时代还算幸运，几乎没有过罚站的经验，但我刚刚做老师的时候也像电影里的苗老师一样在班里面说一不二。工作的第二年，我当了初三的班主任，更是有点“大权在握”的感觉，对学生不免有疾言厉色的时候，也曾像影片里的“苗霸王”那样让学生罚站——电影里让我不能接受的一个镜头，是苗宛秋老师用餐巾纸擦掉婷婷的口红，那种粗暴、蛮横的做法，是教师权力中心思想的一种表现。我没有干过同样的事，可是也有过类似的经历。那时候，每天早上六点左右出早操，有些学生起不来，我总是跑到宿舍门口吼上几嗓子，今天想来，那个腔调是很粗鄙的。

还记得班里有学生学不好，好逞能，调皮，不服管，说起话来像个小流氓，我曾经揪过他的耳朵，他一边叫一边说，老师你把我的耳朵弄痛了。许多事情都忘却了，这件事却每每浮上心来，说起来，我是欠他一个道歉的，也真的希望能有机会见到他，向他道歉。我还曾经怀有私心地批评过我班上的两个学生，不知道他们是否会觉察到。一个老师的权威不仅仅建立在他的知识结构与人生阅历上，也建立在他的社会身份上，而利用这种身份以及知识、阅历上的丰富性凌驾于学生之上是不道德的。这是我反省自己教学生涯的一个基本判断。

我在那所学校工作了五年，教的是社会发展简史以及公民课。今年刚刚联系上的同学告诉我，那些教室已经破败不堪，不能使用了，有的已经拆掉了。拆之前，他们几个同学一起去拍了照片，做了相册，算是为青春保留一些记忆的片段。对我而言，那日只是上课、改作业、打球，过着一眼望到头的生活。回到家，与老父对坐，也是话不投机的时候居多。只有跟同事出去吃饭，喝羊肉汤，喝酒，才能找到一些教学之外的乐趣，因此离开几乎是唯一的选择。如今回想起来，竟也十分怀念那段时光，并不是

自己有多好，生活有多好，那只是一段比较重要的生活经历，一种存在方式开始的地方而已。有位学生曾在我的一篇文章后面留言：老师，我们想念你，不知何时能相聚。让我感到惭愧的是，已经很久没有他们的消息了，在街上遇见也认不出来了，——但他们也许会认出我来。

此后人事流转，迁徙南北，颇尝了一点生活的辛酸滋味，于是以前读不懂的书突然有点懂了，不懂得的人事也突然懂了。最幸运的事，便是定居在上海这座城市，再次开始教书，先后教过中专生，教过最好中学的学生，也教过国际学校的学生。人到中年，似乎才慢慢磨去了一些暴戾之气，归于素朴。要感谢上海这座城市“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”和公平待人的精神，尤其要感谢我的学生们，感谢他们对我坏脾气的宽容，感谢他们偶尔出现的质疑，让我慢慢省察自我，渐渐懂得教育、教学的真谛是爱，而不是威权、成绩之类的东西。我相信这是一个相互建构的过程，你们用数不清的美好瞬间与偶然塑造着我，使我在竭尽所能帮助你们走出迷茫和迟疑。

另一件幸运的事，是我在十年前懵懵懂懂地闯入了国际教育这一块，让我对中文教学有了新的理解，大大扩展了我的眼界。那个时候是主张文本细读的，大抵是受了新批评理论的影响，而目前更新的教育理念则是将互文性理论、后结构主义以及法国哲学家们的权力理论引入到文本阅读与阐释中，关注全球性问题，注重国际情怀以及说、读、写、视、演、示、表演等多重能力的培养，试图与这个急剧变动的世界相适应。这些主张以及教学实践，一直在塑造着我，使我与学生们一起成长。

在长达三十年的教学生涯中，我并不确切知道带给学生们的究竟是伤害多些，还是启发多些，我所记住的常常是一些他们带给我的美好的事。记得有一年上高三，下课的时候有个学生在楼梯口拦住我，说：老师，我给你带了一包香椿芽，山东老家的。原来那时在上郁达夫《故都的秋》，我说起南方的馒头都是馒头，用一个手指按下去就塌掉了，还津津有味地说起故乡的香椿芽如何好吃之类的话，那个学生家是山东淄博的，居然从老家叫人寄了一些来。

还记得我离开那所学校的时候，我所教的学生正是高二，第二年毕业的时候，全班三四十个人聚在一起请我一人吃饭，那情景有些感人的，也有些沉重的，至今让我无法忘怀。

还有去年年底的时候，学生们偷偷给我买了一个蛋糕，给我过生日，蛋糕上还画了我的头像，写着我说过话。我向来没有告诉过学生我的生日，也从来不曾把过生日当回事，但那真是一次难忘的生日课。

今年毕业的学生，把我过去几年说过的三百六十五句话写下来，印成小册子，在毕业典礼的那一天送给我，其中也包括了一些不好听的话。还有许许多多学生送给我贺卡，上面写着许多动人的话，有的是从南极、北极圈寄来的。时间虽然在流逝，有些学生也很久没有联系了，那些记忆是不会消失的。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。我个人认为，教育过程中教师也许曾经给学生一些知识，但学生反馈给我们的，实在要比那些多得多。在网络时代，获取知识的途径越来越多，如果还停留在传授知识的层次，做老师的日子恐怕不好过。

我只是一个很平凡的老师，我想，所谓教学，简单说来就是一边教，一边学。所谓教，就是知行合一，教导他们如何找到独立的自我，建立自信并感受到学习的快乐，学习做事的方法，发展良好的品行，鼓励他们走出原生家庭的负面影响，引导他们认识并追求光明俊伟的人格；所谓学，就是既要学所教学科的知识和方法，学习如何认识社会与人生，同时也要向学生学习，学习他们的纯真、聪慧与创造力，学习如何爱他们，如何在爱中做些建设性的事情。再说回到电影——《老师·好》是向老师致敬的片子，同时也在向青春致敬。不过，“致敬”云云，大抵是青春已逝的人才可能想到的事，置身现场的人往往“鲜衣怒马”，年少轻狂，感觉不到青春的贵重。而老师是以陪伴青春为业的人，是青春的一种旁证。



「文汇报」
微信二维码

音乐好听。音乐难写。相较于文字之间、不同语种的相互翻译，将诉诸听觉的音乐感受，转化为文字，难度更高，几不可能。对那些勇于接受挑战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写作者，我历来抱有敬意。前不久在浙江开会，遇到老友刘元举，谈起新近出版《交响乐之城》，引起我的兴趣，很想知道，以作家之笔演绎音乐，元举是怎样化解难题的。

元举兴趣广泛，热情随性，文学之路多有转折。当机遇与挑战降临时，他敏于抓住适合自己的平台，笼络起激情，让文字跨界沉淀下来，早年致力于建筑与文学联姻，著有《表述空间》《追逐建筑》，近年转向音乐。十年前，他为写作一部音乐与建筑的书《城市·大演奏厅》，走进深圳交响乐团体验生活，后被聘为乐团驻团作家，《交响乐之城》就是他身入深圳交响乐团，十年音乐生活的随笔录。

《交响乐之城》不同于一般音乐欣赏文字。借由独特的身份优势，作者得以沉浸在乐团的音乐世界里，不仅对中外经典乐曲、知名演奏家耳熟能详，舞台上各司其职的音乐人，日常生活中有着怎样的秉性特质，舞台上呈现怎样的艺术风貌，他都谙熟在心。这使他的笔触像音乐家的耳朵一样，在演出、排练现场，总是能够发现亮点，敏锐地选择最恰当的角度，时而单镜头特写，时而俯仰全场，时而直击内心，时而逸出闲趣，弦管弹打，台上台下，全方位烘托出音乐会的现场感。音乐需要诠释，音乐更需要心相系的感染与渗透。通过场景描写，聚焦人物，烘托气氛，以现场感受，牵带背景追溯，取文学之长，托音乐之妙，于公众场域析出个人心得，正是该书的聪明之处，副标题——“一个作家的音乐现场”，将其特点概括得颇为准确。戴着半截手套弹琴的傅聪，以“涩”弓法演奏小提琴的薛苏里，掀起中国钢琴风暴的但昭义……一个个披着岁月风尘的音乐人，就这样个性鲜明地呈现在读者面前。

书中有诸多音乐场景，我最欣赏的是作者对于各路指挥大师的描写——美国指挥家唐纳德·波特诺伊，这位绅士老者，“发胖而笨拙的形体，瞬间可以在音乐中变得灵动起来，尤其上肢、颈部，有着神奇的灵动与敏捷，指挥棒在他手里像根细针，他以穿针引线的方式，平稳地在乐队各声部间缝补连



笔会

鸢尾花

(坦培拉)

田莉

在音乐中沉醉

——读刘元举《交响乐之城》

谢大光

只是以更加坚毅锐利的目光，扫描着他的乐队，以最简洁的动作，完成了最富张力的高潮段落。甚至可以说，他的这场指挥完全可以靠眼神去完成。他的淡定与平稳，给了乐手们更大的发挥空间”。同一个祖宾·梅塔，指挥小提琴协奏曲《乌苏里船歌》，“似乎将自己融入了这条江中，他与薛苏里有着深度默契，不仅是肢体互动感应，更有着内心的浪花翻卷。乐曲结束的那一个定格瞬间，薛苏里与祖宾·梅塔同时激情地扬起手臂，停在半空，还没等落下，全场震动疯狂”。

作者着笔最多、体察最细致的，还是深圳交响乐团艺术总监、著名指挥家克里斯蒂安·爱华德。这位儒雅的德国学院派指挥，从未以大师自居，慈祥多于棱角，“他个子并不高，紧绷着嘴唇，眉头锁出两道挺深的沟纹，更像忧郁的诗人，不成想，他挥手之间，居然翻云覆雨，魔法无边”；“他敏感极了，不仅对一个乐音，哪怕队员们每一次呼吸的调整，都与他息息相通”。他平常只穿两件T恤，“一件白色的，一件黑色的，一上午排练，白色T恤已经被汗水水浸透黏在皮肉上，下午一上台，便更换了黑色的T恤。正是在那一次次被汗水浸透的T恤更换之中，让深圳交响乐团焕发了新的容貌”。

作者还捕捉到爱华德与女儿演出中的互动：钢琴家娜塔莎·爱华德演奏贝多芬《第四钢琴奏鸣曲》，“开篇的钢琴语言似乎不够饱满，音色稍欠光彩，经过指挥爱华德恰如其分地让乐队衔接‘补充’，乐队的激情挥洒出来，使钢琴与乐队在整体效果上走向深沉与恢弘”。爱华德“不时关注着女儿的触键，尤其到了独奏乐段时，华发闪烁、面色红润的‘老爷子’从侧面注视女儿，生怕错过了什么，眼神中有鼓励，

而祖宾·梅塔，则完全是四两拨千斤的大师风格，“即便刚一出场掌声雷动时，他的面部也仅是象征性地报以浅笑。他的指挥没有任何花哨的动作，采用白描手法，淡出淡入地将贝多芬《第六交响曲》展现开来”，面对《第七交响曲》，舞曲的强劲节奏在不断重复中如浪拍岸，“祖宾·梅塔依然稳如磐石，

“如皋”其名，是一首水汪汪的独句诗！我们江苏的地名，或标区位如南京，或循旧志如苏州，或示吉祥如淮安，或兼而有之如南通，唯有我的家乡如皋独树一帜，把地名鼓捣成一句诗：“如”者到也，“皋”者水中高地也，“如皋”者，到水中高地上去也。小时候就听大人说，我们如皋有两条母亲河，一条从南向北，叫龙游河，一条由东而西，叫运河。两条河从遥远的西汉王朝潺潺缓缓流过来，流成一个方塘，便成了内城河——玉带河，又流成一个圆形，成了外城河——濠河。古典园林权威陈从周教授对此极为称道：“城池拥有‘双环河’是罕见的，这是古城如皋的特色”。

水是如皋古城的造景高手。这民居面河而居，马头墙枕河而眠，石板街携波而行，一人卷依依水而憩……全是水的创意。双环城河上有二十多座桥，远远近近地看过去，每一座都是风景。很多地方以水著称，但是我由衷地觉得，只有我们双环城河的水才如苏轼的绸缎一

水韵如皋

陈根生

有人说，“绘者画也”，反正都是说园中多条水流形成美丽图画。跨进水绘园，脚步便被水缠绕住，蜿蜒曲折绿染翠葱都是水，廊前水盈盈，轩后水汪汪，这里的水能把人的心都浸得湿漉漉的。陈从周教授叹之“天下名园也”！他曾经掰着手指称，水绘园与苏州拙政园比并不“略输文采”，与绍兴沈园比亦非“稍逊风骚”，与南京瞻园、上海豫园比更不欠缺自然。如果说苏州园林是人工中见自然，如皋水绘园则是自然中见人工。我尤其欣赏这座文人园林的景点题名：妙隐香林，壹默斋，枕烟亭，寒碧堂，小沼溪，鹤屿，烟波玉亭，因树楼，涩浪坡，镜阁，碧落庐……让人走到一处

就感到一处不一样的诗情画意。董小宛的丰姿自然不必多提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，她是中國历史上十大名厨之一，今天来如皋作客的她还品尝到这位美食女神手的董糖、跑油肉、蟹黄鱼圆……

中禅寺东厢房，大散文家曾巩(1019—1083)少年时曾在此读书。有趣的是，《如皋县志》也好，历代文人文字也好，一直认为那里的隐玉斋是“曾肇读书处”——这是个延续九百年错误的。曾易占任职如皋县令时，其子曾肇尚未出世，随父在如皋读书的只能是曾肇之兄曾巩(13岁—15岁)。隐玉斋有一棵“六朝松”枝叶繁茂，生机蓬勃，据说是曾巩之父亲手栽在窗外的。

走乏了，弄了张小板凳坐在明迎春桥头，喊一碗豆腐脑、一只烧饼，再沿着濠河水边继续漫步。我牵着晚风，挽着岸柳，大声呼唤每一座桥的乳名，而前面迎接我的景物不是林风眠如梦似幻的水彩，就是陈逸飞色彩明丽的油画。从高处回望，我的如皋，浸润在粼粼碧波中……